

论历史学中的偶然性

====评普列汉诺夫的历史观====

谭天荣

tr359@126.com; tr359@yahoo.com.cn

Abstract: 十八世纪的研究历史哲学的人把历史事变归因于“能批判地思维的个人”的“自觉的活动”，很少想到在历史进程中起作用的“一般原因”。相反，十九世纪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把历史看作一个规律性的自然过程，但他们没有对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给予一个确切圆满的回答。而普列汉诺夫在该书中所阐述的“现代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则既承认历史的一般原因，又承认“个体的作用”，对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给予了一个最好的答案，未来属于这种历史观。 [Academia Arena, 2010;2(5):49-56] (ISSN 1553-992X).

Keywords: 历史; 哲学; 事变; 思维 [Academia Arena, 2010;2(5):49-] (ISSN 1553-992X).

一

普列汉诺夫在《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一书中对近代的历史学的发展进程作了如下描述：

十八世纪的研究历史哲学的人把历史事变归因于“能批判地思维的个人”的“自觉的活动”，很少想到在历史进程中起作用的“一般原因”。相反，十九世纪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把历史看作一个规律性的自然过程，但他们没有对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给予一个确切圆满的回答。而普列汉诺夫在该书中所阐述的“现代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则既承认历史的一般原因，又承认“个体的作用”，对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给予了一个最好的答案，未来属于这种历史观。

不幸的是，普列汉诺夫所说的“现代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只放出过一道暂短而清冷的闪光，随后就销声匿迹。现在，对于二十世纪的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人们都很少追溯其“历史的一般原因”。不是说“在这里，决定性的因素是人们的思想状况”，就是说某一历史事件的原因是某某人的某种“观念”或“情结”，等等。这实际上回到了十八世纪的观点。

为什么在人类思想史上会有这样的反复呢？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得写一部二十世纪的思想

史，这不是本文的任务。在这里，我只想到两个显而易见的原因：

第一，二十世纪的历史进程有其独特性。如果说十八世纪末叶法国大革命惊天动地的事变显示了一种隐藏的、如同自然界中自发势力那样盲目地而又依照某些确定不移的规律作用着的历史必然性，那么，二十世纪的种种事变却处处表现出强而有力的个人的奇迹般的“能动性”。

第二，普列汉诺夫所说的“现代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本身似乎还不够完备，面对二十世纪那些乍一看来十分古怪的历史事件，它显得无能为力。

本文试图对普列汉诺夫的历史观作一点修改和补充。

二

普列汉诺夫在他的这一名著中引用了法国诗人圣博甫对法国复辟时代的“宿命论”历史学派的如下质疑：“假若米拉波因偶患寒热病死去，假若罗伯斯比尔忽然被偶然掉下来的一块砖头打死或因患中风病死了，假若拿破仑中弹殒命了，那么事变的进程难道不会有所变更吗？难道你们敢于断定说事变的结局仍然是那样的吗？当我所假定的种种偶然事件充分具备时，

事变的结局就会与你们所认为不可避免的那种结局完全相反。”

对于这一质疑，普列汉诺夫作了如下回答：

“圣博甫以为他所指的那种细小暧昧的原因完全具备时，法国革命将会有与我们所知道的结局相反的结局。这是个严重的错误。不管心理上、生理上的细小原因结合得怎样奇巧，它们也决不会消除引起法国革命的种种巨大社会需要；当这些需要尚未得到满足时，法国的革命运动是不会停止的。为了使法国的革命运动能有一种与当时实际结局相反的结局，就必须用相反的需要来代替这些需要；但这当然是任何一种细小原因的凑合也办不到的。”

特别是关于拿破仑的雾月十八日政变，普列汉诺夫作了如下分析：

当时法国的形势是：经过大革命，新兴的资产阶级摆脱了上层等级的统治，渴望恢复秩序，而当时的共和制度却因反动的热月政变而受到致命重伤，已经奄奄待毙了。督政府根本无力完成这一任务。这时法国的时势要求像西叶斯所说的那样一把“宝剑”，而拿破仑就是这样一把宝剑，他的雾月十八日政变，完成了恢复秩序的任务。

如果拿破仑在阿尔科拉会战中弹殒命了，那么在法国重建社会秩序的“宝剑”的使命，将由另一个人来担负。事变的一般进程和结局将会与拿破仑在世时大致相同。

如果这位“另一个人”得到拿破仑的位置后，举动比拿破仑温和一点，因此没有激起全欧洲的反抗，那么，他就会死在推勒里宫中，而不是死在圣赫勒纳岛上。那时波旁王族就根本无法回到法国来；这样的结果对于他们来说，当然是与实际上所发生的那种结果“相反”，但对于法国整个国内生活来说，却不会与实际的结果有很大区别。

总的来说，普列汉诺夫对“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的回答可概括为如下基本命题：

A： 领导人物个人特点能决定历史事变的个别外貌，但历史进程的趋势归根到底要由“普遍原因”来决定。

三

乍一看来，普列汉诺夫的这一命题似乎很有道理。但把它应用于具体问题，就会发现有太多的不确定的东西。例如，对于二十世纪俄国的十月革命来说，什么是它的“个别外貌”，什么是它的“历史进程的趋势”？还有，这次革命的成败是否取决于当时的领导人列宁和托洛茨基的个人特点？如果俄国十月革命的失败，是不是一个与我们所知道的结局相反的结局？等等。根据普列汉诺夫的上述泛泛之谈，很难对这些问题给出明确的结论。

还有，普列汉诺夫说：如果在法国重建社会秩序的人不是拿破仑而是另一个人，则波旁王族可能无法回到法国来。这么说，在法国历史上，波旁王族复辟乃是一个偶然事件。可是，如果一位信奉普列汉诺夫的历史观的学生写一篇关于法国波旁王族复辟的博士论文，他肯定会把这一历史事件描述为到那时为止法国历史进程的必然结果。这么说，在法国历史上，波旁王族复辟却是一个必然事件。那么，这个事件到底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呢？

再说，从上下文来看，圣博甫所说的“法国革命将会有相反的结局”，不是指一种与当时巨大社会需要相反的结局，而是指更具体的、并不与当时的社会需要相矛盾的“相反的结局”。因此，对于圣博甫的质疑，普列汉诺夫的回答显得答非所问。

对于二十世纪的某些历史事件来说，普列汉诺夫的上述论点更显得难以服人。有些有深远意义的事件，像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似乎完全是由毛泽东一手造成的。如果有人问：“即使没有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照样会发生，对于中国整个国内生活来说，不会与实际的结果有很大区别。”我想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会觉得难以置信。

或许，在普列汉诺夫的历史观中，使历史学家们感到困惑的是一些别的问题，但是无论如何，这种困惑使得许多人，特别是年青人因此完全放弃“历史必然性”这一范畴。下面是一个例子。

托洛茨基在他的自传《我的生平》中写道：“人们曾不只一次地问我，甚至现在还有人问：您怎么会失掉了政权！”托洛茨基的回答是：“这

是历史的必然，因为每次革命之后，都会出现‘热月政变’，无产阶级革命也不能例外。”

对于托洛茨基的这一论点，《我的生平》一书的中译者（下面简称“译者”）不以为然，他在《译者前言》中说，这表明托洛茨基“过分热衷理论，书生气十足。”译者认为：“任何一场政治或权力之争，胜负都是由实力对比决定的。”言外之意是：如果托洛茨基的实力更强，就能战胜斯大林。什么“无产阶级革命的热月政变”，只不过是书呆子的空谈而已。

这位译者就根本不相信有什么历史必然性，他写道：

“一般说来，规律越普遍，它所能解释的事物就越多，因而也就越笼统、越空泛。因此，任何一条普遍规律都要有无数特殊规律来补充。如果说人类社会的发展遵循一条普遍规律的话，则任何一个具体社会的每一步发展都存在无数的可能性，最起码是几个可能性，至于哪种可能性成为现实，往往只是一些微小的偶然因素所致。无论哪种可能性成为现实，我们都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前此的一切因素都促使社会朝这个方向发展。但另一种对立的可能性成为现实时，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根据来证实这种现实是历史的必然。”

这段话说白了就是：“所谓‘历史的必然’只不过是事后诸葛亮们杜撰出来的套话。”在这里，译者从“微小的偶然因素”对历史进程显而易见的影响得出了不存在历史必然性的结论，这正是圣博甫的论点。这就迫使我们再次回到普列汉诺夫所描写的这场历时数世纪的论战的起点，并重新经历论战每一个阶段。

我想，谁也不会否认“微小的偶然因素”对历史进程的影响，问题在于这种影响能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方向？如果能，历史还是不是一个有规律性的自然过程？

四

回到托洛茨基的《我的生平》，在该书的另一处他写道：

“如果在1923年初我们（指托洛茨基和列宁）联合起来向中央委员会发动进攻，无疑会确保我们获胜。不仅如此，毫不怀疑，如果我能

十二大前夕以‘列宁托洛茨基联盟’的精神来反对斯大林的官僚主义，即使没有列宁的直接参与我也能取得胜利。至于这个胜利的牢固程度如何，则另当别论了。这取决于国内、工人阶级内和党内的一系列客观过程。这是一个独立的大题目。1927年克鲁普斯卡娅曾说过，如果列宁仍然在世，他恐怕也会成为斯大林的阶下囚。我想，她是对的。因为问题不在于斯大林本身，而在于斯大林所代表的连他自己也不明白的那种势力。”

托洛茨基的这段话是说，在1923年，当斯大林刚展开夺权斗争时，有两种可能的结局。一种是现实的结局：斯大林从托洛茨基手中夺取了政权。另一种则是托洛茨基这里设想的结局：托洛茨基和列宁联合起来反对斯大林的官僚主义，斯大林夺权失败。我们不妨假定，这两种结局中的哪一个变成现实，取决于当年托洛茨基的一念之差。但托洛茨基认为，这一个“一念之差”并未改变了苏联历史的方向。他断言：无论这两种结局中的哪一个实现，斯大林最终还是取得胜利，托洛茨基甚至列宁那样的老一代革命家最终还是会成为斯大林的阶下囚。这是历史的必然，或者，像有些人常说的，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在这里，客观规律主要是指“斯大林所代表的连他自己也不明白的那种势力”的作用，正是这种势力导致对应于十月革命的“热月政变”。诚然，托洛茨基本人并未指出这种势力是什么？也没有论述为什么每次革命之后都会出现热月政变？看来，他把这个“独立的大题目”交给了未来的历史学家。

托洛茨基关于的热月政变的论断，指出了一种历史现象。在我看来，这种历史现象可以作如下理解：对于像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这样一种类型革命进程来说，我们可以把革命的动力粗略地分为两个因素：领袖人物的思想状况和整个社会的经济状况。另一方面，我们又可把该革命历史进程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夺取政权阶段和保持政权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中，革命的动力两个因素都在起作用。但是，相对来说，在夺取政权阶段，领袖人物的思想状况的作用更大；而在保持政权阶段，整个社会的经济状况这一因素却会逐渐占上风。对于我们所考察的这一类革命进程来说，后一因素比前一因素更保守。而“热月政变”就是这种保守的经济因素战胜革命的思想因素的转折。对于十月革命，对应的“热月政变”乃是斯大林为

代表的俄国当时的保守的经济因素战胜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革命的思想因素的转折。

十月革命的成功，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高瞻远瞩、历史洞察力、魄力和组织能力无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是革命的思想因素的作用。不论俄国的工业多么落后，不论俄国的无产阶级人数多么少，从这种革命的思想因素的角度来看，可以说十月革命是一次“无产阶级革命”。但是，俄国整个社会的经济状况却基本上处于中世纪的阶段，这个经济状况要求一种类似中世纪的政治统治方式。斯大林恰好代表了这种统治方式。这就使得斯大林具有托洛茨基说的“连他自己也不明白的那种势力”。这种势力使得斯大林战胜托洛茨基，而这也就是对应于十月革命的热月政变，这就是托洛茨基所说的“历史的必然”。

五

人们常说：“历史不允许假设。”这句话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意味深长，在日常生活中也往往给人带来安慰或伤感。但这一命题似乎不能理解为“历史学不允许假设”。因为如果禁止假设，历史学就没有任何想象的空间，从而变得不能思考了。

其实，人们从来就在历史学中应用假设。在上面引用的圣博甫的质疑中，每一个“假若”就是一个“历史学的假设”。同样，托洛茨基在《我的生平》中所说如果在1923年初我们如何如何，将会如何如何，这也是一个历史学的假设。圣博甫和托洛茨基似乎没有因此而遭到非难。看来，主张“历史不允许假设”的人对于别人在历史学领域里应用假设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因此，当我下面谈到类似的历史学的假设时，敢于期待同样的宽容。

从圣博甫和托洛茨基上述例子中我们看到，所谓“历史学的假设”，就是对于所考察的历史事件，在想象中改变它的某一前提而保持其它条件不变，再设想其可能的后果。所谓“历史的必然”，是指该历史事件在这一改变下仍然保持不变的东西。而与这一必然性对应的偶然性，则是随着这一“前提的改变”而改变的东西。

在托洛茨基的例子中，“某一事件”乃是斯大林从托洛斯基手里夺取政权，“前提的改变”乃是托洛斯基的“一念之差”，“历史的必然性”则是斯

大林最终获得胜利；而对应的偶然性则是1923年斯大林夺权成功。

对于同一事件，我们还可以设想别的“前提的改变”。例如，我们可以假定，当年十月革命的领导人，国内战争的红军统帅，不仅具有托洛斯基那样的才能，而且也像斯大林那样善于搞权术。在夺取政权时期，他凭借自己的才能成了革命领袖；到了保持政权时期，他又靠自己的威信或靠玩弄权术成了俄国的保守的经济因素所要求的独裁者。那么，对应于十月革命的热月政变就会不再伴随着领导人的更迭。换句话说，不再采取政变的形式，但同样会导致斯大林时代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这是在十月革命的特殊传统下，俄国的保守的经济因素导致的一种特殊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今天，人们不确切地称它为“个人崇拜”。

那么，能不能对历史的前提作更大胆的改变呢？比方说，能不能设想在1917年十月革命中布尔什维克失败呢？在我看来，这种设想并不是不着边际的，当年布尔什维克并未占绝对优势，完全可能由于某种“微小的偶然因素”而遭到失败。因此假定当年布尔什维克遭到镇压而设想其可能的结局，对于历史学来说并不是没有意义的。

显然，如果十月革命失败，则千百万人的个人命运将大大不同。例如，列宁和托洛斯基将成为二流的历史人物，而斯大林则更会默默无闻，或许只有专家才知道他的名字。不仅如此，二十世纪的俄国历史将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但是，我们更感兴趣的是，在这种“前提的改变”下，还有什么东西保持不变。例如，如果在1917年以后俄国的沙皇复辟了，新的沙皇俄国和苏联有什么共同点。

在苏共二十大之前，这个问题被认为是荒谬的：苏联是天堂，沙皇俄国是地狱；苏联是绝对的光明，沙皇俄国是绝对的黑暗，两者怎能有什么共同点呢？前苏联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在他的名著《古拉格群岛》一书中，却为我们描述另一幅图景，似乎布尔什维克的统治比沙皇的统治还要严酷得多。在他看来，两者似乎也很少有共同之处。

在这里，我们不要忘记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的如下名言：对于人类历史，我们应当

注意的，“不是暂短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历史变迁的行动。”

其实，法国历史学家莫诺早就类似的话，他说：

“史学家太习惯于一味注重人类活动的那些光辉灿烂、显赫一时的表现，注重伟大的事变和伟大的人物，却不去描绘经济条件和社会制度的伟大而缓慢的运动，这种经济条件和社会制度正是人类发展中真正重要而具有非暂时性质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是在某种程度内可以归结为规律，并且在相当程度上还可以加以精确分析的。”（转引自普列汉诺夫的前书。）

不论成功还是失败，十月革命对人类历史毕竟只是暂短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与俄国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制度的伟大而缓慢的运动相比，它的影响要小得多。

那么，如果十月革命失败，俄国将走向何方呢？我想，如果马克思遇到这一问题，他会再一次说：“镇压这次革命的人，将成为革命遗嘱的执行人。”

诚然，对于过去的革命运动，马克思一而再、再而三地说过这句话。但我想，当我把这句话用于十月革命时，却会引起人们狂怒：难道沙皇会给农民土地吗？难道科尔尼诺夫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吗？难道邓尼金会建立集体农庄吗？人们不会谴责马克思，马克思是永远不会错的，如果他说让人不开心的话，不妨束之高阁，就当他没有说过。但我却不会这样幸运，人们肯定会严厉地谴责我，不是说马克思没有说过这句话，我伪造马克思主义罪大恶极；就是说马克思这句话不是这个意思，我歪曲马克思主义居心叵测。

然而，不论马克思这句话对十月革命的应用多么伤害人们的感情，它却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思想实验，来检验我们对马克思的历史观的理解程度。因此，我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为之一试。

一场革命的遗嘱当然要指明它所要完成的任务。那么，什么是十月革命的任务呢？过去人们一直相信，十月革命的任务在于建立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在这种信念下，我们的思想实验只能一无所获。幸运的是，自从苏共二十大

以后，这种信念已经动摇了。经过数十年的反思，我们终于发现，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乃是一个借助于军队和机关，直接对公民社会进行统治的国家，专家们称这种制度为“拿破仑主义”制度。这是由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斯大林的坏脾气。既然如此，即使当年十月革命失败，俄国社会也将经历这个阶段。于是我们得出结论：按照当时俄国的社会需要，无论十月革命成功还是失败，俄国都将从此建立“拿破仑主义”制度。

十月革命实际的结局是，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按照俄国的社会需要，斯大林以极为独特的方式建立了俄国的拿破仑主义制度。尽管这种制度与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革命理想大相径庭，但十月革命的传统还是在这一制度上刻下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的各种标志和痕迹。有这种特色的拿破仑主义制度，就是赫鲁晓夫所说的“个人崇拜”。

如果十月革命失败，那么，镇压这次革命的人（以某个沙皇或共和主义的独裁者为代表），就会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建立这种制度。诚然，他们建立的制度将会有另一种标志、另一种痕迹，但它和苏联的“个人崇拜”一样，也是一种拿破仑主义制度。在这种意义下，建立这种制度的人执行了十月革命的遗嘱。

六

上面，我们看到三个历史必然性的例子：第一个是斯大林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的权利斗争中获胜；第二个是苏联出现“个人崇拜”；第三个是俄罗斯经历“拿破仑主义”的历史阶段。从这三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把“历史的必然性”理解为在某一“前提的改变”下保持不变的因素，反之，随着这一“前提的改变”而改变的因素，则是“历史进程中的偶然性”。在这种意义下，偶然性与必然性总是成对出现的。

反过来，同时给出一对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也就确定了与之对应的“前提的改变”。这一点，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三个例子阐明如下：

例一，如果给出如下一对命题：

1. 斯大林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的权利斗争中获胜是一个必然事件；

2. 1923年，斯大林从托洛斯基手里夺权成功是一个偶然事件。

那么，我们知道与之对应的“前提的改变”是托洛斯基的“一念之差”。

例二，如果给出如下一对命题：

1. 十月革命成功之后，苏联出现“个人崇拜”是一个必然事件；

2. 在布尔什维克的党内斗争中，斯大林战胜托洛斯基是一个偶然事件。

那么，要改变的前提乃是如下历史事实：十月革命的领导人、国内战争的红军统帅是理想主义者托洛斯基，他对争权夺利一窍不通。

如果给出如下一对命题：

1. 俄罗斯在二十世纪出现拿破仑主义是一个必然事件；

2. 俄罗斯的拿破仑主义采取个人崇拜的形式是一个偶然事件。

那么，要改变的前提乃是如下历史事实：在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中，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

在许多场合，我们不必指出对应的“前提的改变”，但这时必然事件和偶然事件必须成对出现。如果对于一个历史事件，既不给出“前提的改变”，又不指出与之对立的事件，孤立地问它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则谁也无法得到确定的回答。人们只好说它“既是必然的又是偶然的”。这是辩证法中最典型、或许也是最令人困惑的一个命题。

例如，“斯大林战胜托洛斯基”这一事件在上面的第一对命题中是必然的，而在第二对命题中则是偶然的；“俄罗斯出现个人崇拜制度”这一事件在第二对命题中是必然的，而在第三对命题中则是偶然的。

从上述三个例子我们还看到：对于一个特定的历史过程，必然性分成一些等级，较低级的必然性在较高级的必然性面前，就呈现为偶然性。例如，在二十世纪的俄国革命中，斯大林

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的权利斗争中获胜、苏联出现“个人崇拜”和俄罗斯经历“拿破仑主义”的历史阶段，就是必然性的三个等级。第一个必然性在第二个必然性面前呈现为偶然性，第二个必然性在第三个必然性面前呈现为偶然性。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偶然性不是一个事件的属性，而是两个事件之间的关系。在这种意义下，偶然性是一种相对的东西。

七

不幸的是，普列汉诺夫未能掌握偶然性的这种相对性。诚然，他也说过：“偶然性是一种相对的东西。”但他的这一命题具有另一种含义，他是指“偶然性只会在各个必然过程的交叉点上出现”。不能说这句话错了，但它对历史学没有多大意义。普列汉诺夫对历史必然性的认识之所以导致矛盾，就是因为他未能掌握偶然性的相对性。

还是以法国波旁王族复辟为例。一方面，如果在法国重建社会秩序的人不是拿破仑而是另一个人，则波旁王族可能无法回到法国来，因此它是一个偶然事件。另一方面，这一历史事件乃是到那时为止法国历史进程的必然结果，因此它是一个必然事件。按照普列汉诺夫的历史观，这一矛盾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毛病在那里呢？这一矛盾是由双重的概念混淆引起的。

我们已经看到，在“波旁王族复辟乃是到那时为止法国历史进程的必然结果”这一命题中，其中的“必然”是指某一历史事件在给定的“前提的改变”下保持不变的东西，如果还说它是“历史必然性”，则它就已经是“历史必然性”这一用语的另一种含义了。在这种含义下，说一个历史事件当时的实际结局是必然的，乃是指它是过去的整个历史进程的必然结果，其中包括该事件的各个等级的必然性的总和。在这种意义下，与它相反的结局自然是不可能的。普列汉诺夫似乎对历史必然性的这种含义情有独钟，不幸的是，他把这一用语上述两种含义混淆了。这是第一个概念混淆。

此外，在法国历史上，1789大革命之后，肯定会建立资产阶级社会的新秩序，这是必然的；而拿破仑的穷兵黩武，肯定导致波旁王族复辟，这也是必然的。但前者是较高级的必然性，后者是较低级的必然性。普列汉诺夫把不

同等级的必然性也混淆了。这是第二个概念混淆。

从这两个概念混淆不仅会得出上述矛盾，还很容易引出其它矛盾，其中最突出的矛盾是：普列汉诺夫一方面断言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不容忽视，另一方面又硬性地坚持对于任一历史事件，任何个人的任何行动都不可能导致与当时的实际结局相反的结局。这一矛盾是他的历史观在二十世纪销声匿迹的原因之一。

当然，在与圣博甫的论战中，普列汉诺夫在坚持“历史必然性”这一点上实质上还是正确的，但他的论据必须稍稍改变一下形式。下面，我以俄国的十月革命为例来阐明我对圣博甫的质疑的回答。

俄国的十月革命诚然反映了当时俄国社会的各种需要，但所有这些需要都不足以保证十月革命取得胜利。1870年巴黎公社也是法国当时的社会需要的产物，但它还是失败了。因此，仅从社会需要的角度来看，十月革命是可能失败的，特别是，它可能由于革命领袖的某种失误而失败。我想普列汉诺夫也不会否认，十月革命失败乃是一个“与当时实际结局相反的结局”。但是，无论十月革命成功还是失败，俄国都将从此建立“拿破仑主义”制度。因此，承认十月革命可能由于“微小的偶然因素”而失败，并未否认了历史是一个规律性的自然过程。

在另一种意义下，前苏联出现个人崇拜也是一个规律性的自然过程的必然结果，其原因比人们想象的要深远得多。但是，决不能说斯大林时代的种种历史事件也具有同样深远的意义。在俄国出现个人崇拜的大前提下，它们完全可能由于“微小的偶然因素”而导致与当时的实际结局相反的结局。

现在我们回到法国大革命。诚然，这次革命的动力是当时“巨大的社会需要”，在这种意义下，法国大革命是必然的。但是，相对来说，1789年到1830年在法国发生的各个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必然性，例如拿破仑的雾月十八日政变的必然性，则是较低级的必然性。与法国大革命的必然性相比，它只是一个偶然事件。在满足当时巨大的社会需要的大前提下，它完全可能有与当时的实际结局相反的结局。这样就为拿破仑的历史作用留下了广阔的余地。

八

为了避免普列汉诺夫的上述混乱和矛盾，我把他的命题 A 修改成如下形式：

B: 对于任一重大的历史事件，都可以找到一种不以领导人物的个人特点为转移的历史必然性。

例如，对于十月革命，不以领导人物的个人特点为转移的历史必然性就是俄国将从此建立拿破仑主义制度。现在，让我们把命题 B 应用于中国当代史上的最令人困惑的历史事件 1966 年至 1976 年的“文化大革命”。

把命题 B 应用于这一事件，我们立刻得出结论：“对于新中国，文化大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无论谁处在毛泽东的地位，这一历史事件都会发生。”换句话说：“没有毛泽东也会有文化大革命。”这一结论与当前的权威的结论刚好相反。

为了阐明这一分歧的实质，劈头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文化大革命”。西方的汉学家们说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多维的历史事件”，这是对的。但是，什么是它最本质的特征呢？换句话说，对它要作什么样的改变，它才不再是文化大革命呢？对于这一问题，这些西方学者却不得要领。有人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群众运动、是一场宫廷政变、是一场学生运动，等等。这些都只是表面现象，显然不是文化大革命最本质的特征。还有人说，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的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或一场权势之争，这也没有说在点子上。在世界历史上，又有哪一个重大事件不表现为意识形态的斗争，不表现为权势之争呢？

王若水的说法倒是言之成理，但他探讨的问题不是“什么是文化大革命”，而是“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王若水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归结为他称为“赫鲁晓夫情结”的心理因素。这种论述本来与历史观无关，问题在于他由此得出结论：

“换了别人（例如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中任何一个）处在毛泽东的位置，虽然也免不了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但不会发动‘文化大革命’却是可以断言的。”

并由此得出“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文化大革命”的结论，这就是典型的十八世纪的历史观了。

这种历史观的特点是用对当事人的心理分析来代替对所考察的事件的历史意义的探讨。这相当于用对拿破仑的心理分析来描写雾月十八日政变，用对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心理分析来描写十月革命，用对斯大林的心理分析来描写前苏联的个人崇拜，等等。诚然，这种分析也是历史学的一部分。但是，不言而喻，这种分析不能揭示历史的必然性。

要证明没有毛泽东也会有文化大革命，就得在文化大革命中揭示不以毛泽东的个人特性为转移历史必然性。我想这是二十一世纪的历史学的一个重要任务。作为一点初步工作，我提出如下论据：

新中国成立时，中国有百分之九十的经济停留在古代。这种古代的经济基础将自然地长出一个古代的东方帝国。另一方面，新中国的江山是中国共产党用武力打出来的，她自然力求建立她自己的一党专政的体制。古代的东方帝国是以皇帝和臣民为两极的国家，而一党专政的体制则是以贵族和平民为两极的体制，这是两种相互对抗的历史要求：前者要求铲除处在“伟大领袖”与“人民群众”之间的“作官当老爷”的贵族中间阶梯；后者则要求摆脱“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的任何个人或机构。于是，这两种历史要求就在新中国的成长过程中形成两种政治力量，两个利益集团。前者以毛泽东为领袖，后者以刘少奇为中坚。新中国的历史以这两种力量的斗争为主线，而文化大革命则是这两种力量之间的一场决战。不论谁处在毛泽东的地位，这场决战都是不可避免的。

当然，毛泽东的性格、经历及其知识结构，无疑为这场决战涂上了浓浓的个人色彩，如果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不是毛泽东，则文化大革命的进程可能迥然不同。但是，文化大革命的

许多特征仍将保持不变，其中之一是：如果伟大领袖这场决战中获胜，则与他并肩作战的其它领导人将完全彻底地被剪除。这一结局可能是某一伟大领袖的“晚年的错误”，也可能是另一位伟大领袖青年全盛时期的丰功伟业。为了实现这一结局，可能通过一场规模宏大的群众运动，也可能通过“肃反”、暗杀甚至内战等其它方式。一般地说，实现某种历史结局的方式也是必然的，但和历史结局本身相比，它只是较低级的必然性。

有人说：历史学的任务在于从表面上纷乱的各种偶然事件中寻找隐藏在其中的必然性。因此，历史学所关心的只是必然性，偶然性则是无关紧要的。实际上，偶然的事件也是历史学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例如，文化大革命经历了整整十年，“充满了戏剧性的冲突，惊心动魄的事件，可谓波谲云诡，令人眼花缭乱。”如果我们写一部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就必须把所有这些冲突和事件描述为过去的历史进程的必然结果，这就得同时揭示文化大革命这一事件的各个等级的必然性，其中较低级的必然性都只不过是偶然性而已。缺少对偶然事件的描述，就不能描绘出文化大革命的全貌。

或许，当人们对新中国的这段历史有更多的认识以后，将会发现文化大革命更深一层的必然性。到那个时候，我上面指出的必然性也成为偶然性了。但我相信，即使到那时，我的这一工作仍然中国当代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之所以在命题 B 中指明是“重大事件”，是考虑到如下情况：历史上有些事情，虽然也是历史事件，但为它们寻找历史必然性却是徒劳无益的。“大跃进”就是一个例子。它虽然规模大，时间长，而且导致四千万中国人饿死，却完全是一场空洞的运动。如果当时中国的领导人不是毛泽东，完全可能不发生如此荒谬的闹剧。

2001年12月05日